

人大国发院系列报告

专题研究报告

2013年11月 总第二期

(中国改革系列报告 NPE201301)

晋升竞争是标尺竞赛、锦标赛还是资格赛？

——基于2003-2012年市委书记数据的经验研究

杨其静（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郑楠（中国银行）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UC

人大国发院简介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简称国发院）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独立的校级核心智库。国发院以中国人民大学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优势学科为依托，以项目为纽带，以新型研究平台、成果转化平台和公共交流平台为载体，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对中国面临的各类重大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达到“服务政府决策、引领社会思潮、营造跨学科研究氛围”的目标。

国发院通过学术委员会和院务会分别对重大学术和行政事务进行决策。目前由纪宝成教授担任名誉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陈雨露教授担任院长，刘元春教授担任执行院长。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紧邻新图书馆）

电话：010-62515049

网站：<http://NADS.ruc.edu.cn>

Email: nads_ruc@126.com, nads@ruc.edu.cn

摘要

本文收集整理了 2003~2012 年市委书记的相关数据。我们的经验研究没有找到支持晋升标尺竞赛假说和锦标赛假说的证据，尽管这些假说很流行。在严格限制样本范围之后，我们才发现在市委书记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宽松的晋升资格赛，即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10 的市委书记比其他市委书记享有更多晋升机会。与 Bo(1996)相同，我们发现各市的经济规模对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具有最直接的重大影响。进一步分析还发现那些具有特殊个人禀赋的官员偏好于经济规模大的市而非潜在经济率高的市。总之，中国政治晋升机制既为上级权威留下足够空间，但也不否认对地方官员基本的经济增长业绩要求。

关键词：市委书记、晋升竞争、标尺竞赛、锦标赛、资格赛

一、引言

尽管学者们已形成这样一个基本共识，即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金融体系和产权保护等制度对长期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却难以简单地套用该共识来理解中国持续 30 多年高速增长。这促使学者们从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来寻找答案。当前最流行的假说是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标尺竞赛(yardstick competition) (Maskin et al., 2000)，甚至晋升锦标赛(tournament) (周黎安, 2004)。然而，这类假说面临严重挑战，即在威权体制下中央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不可能设定一个主要依据 GDP 增长率大小来决定地方官员仕途的、完全契约性质的激励机制 (陶然等, 2010)。同时，政治学反复强调在威权政治下当政者选择提拔对象的第一标准是“是否是自己人”而不是“是否有能力” (Shih et al., 2012)。不过，批评者也面临挑战，即难以解释中国地方官员对 GDP 增长率的狂热和中国 30 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

面对上述两难问题，我们不禁要问：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到底是什么，以至于上级组织既能维护自己的权威又能激励地方官员发展经济？在辨析锦标赛、标尺竞赛和资格赛的概念和相应的计量策略基础上，本文提出一个修正性的假说，即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可能存在某种比较宽松的基于经济增长率排序的晋升资格赛(qualifying

competition)。本文的贡献在于利用 2003~2012 年间市委书记的仕途数据检验了这三种晋升竞赛假说。我们没有发现支持锦标赛和标尺竞赛假说的证据，而仅仅为资格赛找到了一些证据。同时，我们再次证实了薄智跃 (Bo, 1996) 的观点，即影响地方领导人晋升的最直接的因素是辖区经济规模而非经济增长业绩。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那些具有某些特殊个人禀赋的官员容易被派到经济规模大的市而非潜在经济增长率高的市担任市委书记。

除了引言之外，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及其评判；第三部分介绍了我国选拔副省级领导干部的制度并由此提出了一些可供检验的假设；第四部分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定义；第五部分是描述性统计；第六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七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八部分是简单的结论。

二、文献综述及其批判

(一) 文献综述

以人事管理经济学(personnel economics)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开创性的研究当属薄智跃 (Bo, 1996)¹。他构建了囊括正、副省长和正、副省长的“人-年”(individual-year)仕途数据库(1949~1994)，所涉及的信息包括：官员个人禀赋(年龄、性别、

1. 薄智跃 (Bo Zhiyue) 在 1995 年申请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位论文是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而 Bo(1996) 是其中的第四章。他的博士论文以专著形式在 2002 年出版后，立即引来大量评论，且在当年应天则研究所之邀而做专场报告，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

民族、省籍、教育、党员身份、任职时间、中央工作经历、当前职位性质), 各省禀赋特征(人口、国民收入), 经济增长业绩(当年经济增长率、任内平均增长率)和对中央的财政贡献(当年财政贡献, 任内平均财政贡献)。通过一系列的计量分析, 他发现: 1978 之后, 辖区的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以及对中央的财政贡献才是影响省级领导晋升的最直接因素, 而经济增长业绩对省级官员的晋升无显著影响。由此, 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基本就是大省的政治, 因为辖区的经济、人口规模和税收贡献更能反映了官员的政治影响力。此外, 他还发现省委书记的晋升机会大于省长, 来自中央的省级领导和直辖市的领导具有更大的晋升机会。遗憾的是, 不知何故, 薄智跃(Bo, 1996)的贡献被很多文献遗漏了!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中国式联邦主义和辖区间竞争理论也正好在该时期盛行²。学者们关注于该体制对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激励作用, 甚至有学者宣称中国已“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地方官员的考评和晋升的激励机制和治理结构”从而使得“地方政府为增长而竞争”(张军, 2005)。该思想指导下的第一份经验研究来自Maskin等人(2000)。他们以各省人均中央委员数量来代表本省官员的晋升机会, 以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前 1 年各省经济增长率的全国排序来代表官员的经济增长业绩。利用中共十一大和十三大中央委员数据, 他们发现经济增长业绩的提升会显著地增加省级官员的晋升机会。由此, 他们认为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可能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标尺竞赛。遗憾的

2. 杨其静、聂辉华(2008)对该理论做了系统的介绍和批判。

是，该实证研究未引入任何控制变量而无法保证其结论的可靠性。

受上述思想启发，周黎安(2004)等人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假说，即中国地方官员之间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锦标赛³。随后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中被引用最频繁的莫过于Li & Zhou(2005)和Chen等人(2005)。他们分别以当年经济增长率、任内平均经济增长率、与前任省领导的经济增长率之差来测度省委书记-省长的经济增长业绩，并发现这些业绩指标对省级领导的晋升有显著的正影响⁴。随后，学者们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测度经济增长业绩指标。比如，现任领导任内平均增长率与1978年至现任领导任职前夕的平均增长率之差额(王贤彬等，2011)，经济增长加速度 $(g_t - g_{t-1}) / g_{t-1}$ (杜兴强等，2012)。虽然这两篇文献都以省委书记-省长数据得到了与Li & Zhou(2005)和Chen等人(2005)相似的结论，但两者实证结果的差别也很明显，即王贤彬等(2011)发现上述各个经济增长业绩指标只对省长的晋升有显著正影响，但杜兴强等(2012)却发现经济增长加速度对省委书记的晋升有更大影响。

然而，除了上述文献之外，据我们所知，至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其他重要文献提供了经济增长业绩会直接影响地方领导晋升的证据。比如，王贤彬&徐现祥(2008)以同样的数据却得出了有悖于王贤彬等(2011)的结论，即前者发现那些被调任中央的省委书记-省长在任内并无显著更优的经济增长业绩，从而暗示他们的晋升并非源于其出色的

3. 也许正是由于周黎安的这些论文未引用Bo(1996)且未将反映辖区规模的变量放入计量模型中，从而导致在此之后的大多数文献忽视了Bo(1996)的贡献。

4. 注意：Li & Zhou(2005)发现省级领导的中央工作背景显著地增加晋升机会，但Chen et al.(2005)却未得到该结论。

经济增长业绩；Wu & Ma(2009)以中共十六大前后两年(2000~2004)省委书记-省长仕途数据也发现省级领导任内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财政收入等对晋升并无显著相关性，仅在全样本回归中发现反映政府公共服务效率的基准分值(PCSB)与晋升显著正相关。当然，更引人注意的是，陶然等(2010)以更统一的标准修正了Li & Zhou(2005)和Chen 等人(2005)所使用的省委书记-省长仕途数据并重复了整个计量过程，却无法得到性质相似的结论。

另外，在地市级或者县级领导的数据似乎也没有发现经济增长业绩决定显著影响晋升的证据。比如，Landry(2003)在1990~2000年全国地级市和副省级城市的市长中也未发现经济增长显著影响晋升机会的证据⁵。另外，Guo(2007)以1999~2002年全国县长为考察对象，仅发现财政收入年增长率对县长的晋升有显著正影响，但却未涉及晋升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这使我们有理由怀疑Guo也未能发现经济增长率与晋升显著正相关的证据，因为经济增长率是最容易获得且被最普遍使用的解释变量。相对而言，姚洋&张牧扬(2013)的研究显得更严谨。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率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地方领导的能力，因此首先基于官员调动而连通的城市组内来识别官员的个人效应，从而得到一个所谓的代表官员能力的“官员顺位”变量。在此基础上，他们以2001~2008年211名市委书记-市长的数据发现官员顺位

5. 以市长为考察对象的还有林挺进(2010)。利用2005年中国264名市长的数据，他考察哪些因素影响了市长成为市长的速度。虽然他强调“政治晋升本质上是官员先前在晋升速率方面的优势的延伸，而不是因为所在行政区的经济业绩”(p.65-66)，但由于计量模型未引入任何刻画经济增长业绩的指标而使得上述观点论据不足。另外，特殊的样本使得该文顶多是在为成功者寻找成功因素，因此该文的意义有限。

才对晋升有显著影响，而任内经济增长对晋升无显著影响。

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单总结：在上述文献中，计量模型还未引入反映地方官员特殊政治关系的变量而且所涉及的样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分析工具都相同或相似，但却已有不少实证研究并不支持晋升标尺竞赛或锦标赛假说。更重要的是，这些假说的理论基础还遭到严重质疑。

虽然文献普遍发现“中央工作经历”会显著地影响地方官员的晋升机会，但晋升标尺竞赛假说或者锦标赛假说却主要在暗示中国官员治理机制中存在一个基于GDP增长率的、完全契约性质的“谁高谁升”的晋升激励安排。这无疑是否定或者大大压缩了中央政府实施权威的空间，从而与中国的威权体制相矛盾(陶然等，2010)。事实上，大量的政治学文献反复论证了一个观点，即威权政治的当政者在选择提拔对象时首先考虑的是“是否是自己人”而不是“是否有能力”，因为他们追求的首要目标不是经济增长(Shih et al., 2012)。为检验该假说是否也适用于中国，Opper & Brehm(2007)构建了一个反映省委书记-省长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间是否有老乡、校友和同事关系的“网络关系指数”(network-ties-index)。随后，他们以1985~2005年省委书记-省长为考察对象而发现：政治关系指数对晋升有显著正影响，但经济增长率对晋升无显著影响，从而认为前者才反应了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筛选机制。在此之后，Shih等人(2012)强调应主要从中国政治精英(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与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来识别其政治关系。同时，他们还认为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能代表省级领导真实经济增长业

绩，因此以时间序列预测法来推算各省级领导任内辖区潜在经济增长能力并将之从辖区经济增长中扣除，从而获得所谓的真正代表省级领导任内经济增长业绩的（相对）惊奇增长(surprise growth)⁶。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自 1960 年以来的任何时期，政治精英的党内排位主要取决于政治关系，而与经济增长业绩并无显著关系。

至此，我们可大致得出结论：相对于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竞赛假说，晋升的政治关系决定论似乎更接近中国的实际情况。然而，后者也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即如何解释中国自 1978 年以来持续的高速增长？何况我们可切实地感受到地方官员对经济增长的狂热。这意味着，无论是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标尺竞赛/锦标赛假说还是晋升派系决定论都未全面而准确地反映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机制，因为：前者否认了中央等上级组织的权威，而后者未给官员发展地方经济提供激励。

为了调和上述矛盾，Jia et al.(2013)提供了一个有益尝试，即在计量模型中增加了经济增长业绩与政治关系的交互项。对于省级领导政治关系的识别，他们借鉴 Opper & Brehm(2007)但又有所不同，因为他们仅仅看重省级领导是否与某位政治局常委有过共事经历并将之设定为政治关系哑变量（有为 1，无为 0）。他们对 1993~2009 省委书记-省长晋升的考察而发现：尽管任内经济增长率本身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经济增长率与政治关系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却显著为正。

6. 具体的计算方法可参见 Shih et al.(2012)的附件。值得一提的是，杜兴强等(2012)的经济加速度 $(g_t - g_{t-1}) / g_{t-1}$ 被 Shih et al.(2012)称为“performance growth”，仅是其计算真正归属省级领导的经济业绩的第一步骤。

同时，他们还发现那些与政治局常委共事时间越长的省级领导，其任内经济增长率越大，即省级领导的经济增长业绩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于政治关系。由此，他们认为经济增长业绩并不是一个地方领导人能力的显示信号，而主要功能是培养忠诚 (loyalty-fostering)。不过，这些实证结论也暗示：只有那些与政治局常委有特殊关系的省级领导才有积极性发展地方经济，而其他省级领导无此积极性。现实情况是这样吗？值得怀疑。事实上，地方官员，尤其是省级以下的地方官员的政治关系非常复杂，而不太可能简单地以一维的共事经历来识别。除了少数官员外，大多数官员所拥有的政治关系并不具有绝对占优的地位，因此他们的晋升竞争应该而且必须是一个复杂的政治博弈过程。

(二) 现有文献的不足

通过上述文献梳理，我们可以感受到学者们对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治理机制的研究日益精深。然而，现有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第一，大多数文献忽视了Bo(1996)的贡献而未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反映辖区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变量⁷，仅仅使用人均GDP来反映辖区经济发展水平。正如Bo(1996)所言，相对于人均GDP，辖区经济规模是一个更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反映了各个辖区在上一级政府中的经济权重和政治谈判力⁸。不仅如此，更大的经济规模也意味着辖区领导人

7.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对中央的财政贡献已经制度化且与当地的GDP高度相关，故该指标不宜再使用。

8. 比如，某省2012年对地级市政府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项考核指标就是“经济绩效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及增速”，其考评方法是：得分=

$$\left[\frac{GDP_i - GDP^{\min}}{GDP^{\max} - GDP^{\min}} \times 0.6 + 0.4 \right] \times 0.5 \times 10 + \left[\frac{g_i - g^{\min}}{g^{\max} - g^{\min}} \times 0.6 + 0.4 \right] \times 0.5 \times 10$$
，其中 GDP^{\max} ， GDP^{\min} 和 GDP_i 分别表示地级市中最大的、最小的和地级市*i*的GDP； g^{\max} ， g^{\min} 和 g_i 分别表示地级市中最快、最慢的和地级市*i*的GDP增长率。显然，该考评指标对经济规模小的地级市非常不利。

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来培育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关系⁹。回顾文献，我们会发现：凡是将GDP或者同时将人口和人均GDP作为解释变量的实证研究(Bo, 1996; Landry, 2003; Oppen & Brehm, 2007¹⁰; Wu & Ma, 2009)都未能发现官员晋升与经济增长业绩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的证据¹¹；相反，那些发现官员晋升与经济增长业绩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实证研究无一例外地在计量模型中缺少反映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变量¹²。这意味着，若不将反映辖区经济-人口规模的指标纳入到计量模型中，则将面临遗漏重大解释变量的风险。

第二，虽然大多数文献都发现地方官员的个人禀赋，比如中央工作经历对晋升有重大影响，但却未进一步考察这些禀赋是通过何种渠道发挥作用的¹³。即便有少数学者意识到该问题，但也因为忽视了Bo(1996)的贡献而将注意力聚焦在官员的政治关系是否会影响任内

通过访谈相关官员而得知，该考评方法就是源于GDP全省占比合计高达50%以上的两个市政府施压的结果。

9. 通过与相关人员的深入交谈，我们还了解到：当组织部门征求那些有实力的省厅局领导是否愿意出任某个小市的领导时，他们时常会婉拒，因为他们害怕自己的仕途之路就此终结。

10. Oppen & Brehm(2007)发现人口规模对省长的晋升有显著正影响，但对省委书记的晋升还有一定的负影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1985-2005期间不仅重庆成为了直辖市而且四个直辖市的书记享有特别优厚的晋升机会。

11. 与这个结论有一点区别的是Mei(2009)。他以1983-2006年河北和浙江两省地级市书记-市长为考察对象的计量结果也很有趣：在浙江，官员晋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却与该市的GDP省内占比之间无显著关系；在河北，情况刚好相反。此外，他还发现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要显著地大于市长。

12. 杜兴强等(2012)构建了历练指数(PEOMAX)=中央工作经历(1,0)+企业工作经历(1,0)+边疆工作经历(1,0)+跨省交流(1,0)，并发现省级官员的晋升与历练指数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然而，被其视为边疆省份中的四川、黑龙江是经济和人口大省，甚至广西和吉林省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全国排名也都在20名之前。比如，广西人口排在全国11位。

13. 杜兴强等(2013)发现边疆工作经历和跨省交流经历可能对晋升产生正影响。不过，一个更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哪些人被安排到了边疆？哪些人被安排了跨省干部交流以及被交流到何处？

经济增长率来影响晋升机会(Jia et al., 2013), 而未考察另一种可能更为重要的渠道, 即有特殊政治关系的官员被安排到经济规模大的地区任职并由此赢得更多的晋升机会。

第三, 大量的文献不仅混淆了锦标赛和标尺竞赛, 而且还完全忽视了资格赛的可能性。锦标赛模型由Lazear & Rosen(1981)提出, 其基本博弈规则是: 只要 $x_i > x_j$, 则参赛者 i 获胜并赢得报酬 ω^{\max} 而 j 失利并只能获得报酬 ω^{\min} ($< \omega^{\max}$)。这意味着, 在锦标赛中胜败及其报酬取决于参赛者业绩的排序而非业绩绝对或相对水平。由此, 检验晋升锦标赛假说的计量策略应该是: 考察经济增长率组内排序前 $N = n$ 的地方领导相对于组内其他领导是否享有更多晋升机会 (注: n 表示可晋升岗位数)。与之不同, Shleifer(1985)的标尺竞赛模型的基本博弈规则是: 若参赛者 i 的业绩水平为 x_i , 则其报酬为 $\omega_i = f(x_i - \frac{1}{m} \sum_{i=1}^m x_i)$ (注: m 表示参赛人数), 即报酬大小取决于自身业绩与参赛群体平均业绩之差额。由此可见, 若以某种绝对值或者差额来测度经济增长业绩 (比如: 经济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之差额), 则计量模型检验的是标尺竞赛假说而非锦标赛假说¹⁴。然而, 在涉及中国官员晋升竞争的文献中, 至今为止似乎只有Maskin et al.(2000)和Wu & Ma(2009)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与此同时, 现有文献还未考虑另一种可能更现实的竞争形态——资格赛。尽管资格赛的具体形式非常多, 但博弈的基本规则是: 当且仅当参赛者 i 的业绩 x_i 在本阶段竞赛中组内排名不低于 $N (> n)$, 他

14. 虽然 Chen 等人(2005)所借鉴的关键文献是 Besley & Coate (1995), 但却未充分意识到: 这篇考察美国各州的税率和与相邻州的税率之差是否会影响在任州长连任机会的论文, 其标题就是: “Incumbent Behavior: Vote Seeking, Tax Setting and Yardstick Competition”。

才有资格参加下一阶段竞争（注： n 表示下阶段竞赛的可获胜利席位）。

第四、为了更严谨地检验经济增长业绩影响晋升假说或者能力决定晋升假说，学者们尝试着用各种复杂的方式来测度真正属于地方官员的经济增长业绩和能力。然而，作为人事管理经济学基础的契约理论和管理实践特别强调，只有那些易于观察、识别和操作的变量才能成为契约变量。不难想象，上级领导在评价下级地方领导的经济增长业绩时所使用的评价指标也必然是简单而直白的，其中经济增长率及其排序无疑是最常用的经济增长业绩测度指标。同时，由于年度经济增长率的绝对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因此无法简单地根据经济增长率水平来判断某个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业绩是优、良还是差。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奖励名额有限的竞争活动中，参与者主要关心的还是自己成绩的排位而不是成绩的绝对或者相对水平。

第五，有关任职时间的问题。现有文献几乎都以当年经济增长率及其相对值，或者包含当年在内的任内平均经济增长率及其相对值来解释官员当年职位变动。然而，即便官员职位变动发生在12月31日，该年的各种经济数据都还没有被统计出来，因此根本不可能成为上级组织考核评价下级官员业绩的依据。何况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的职位变动通常都需要长时间的酝酿。

第六，学者们已普遍意识到，对于检验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竞争假说，市县级领导更合适。这是因为：除了都不承担外交、国防、宏观经济调控和制定国家战略等职责之外，与省级政府相比，市县级

政府所承担的政治职能要弱得多而发展地方经济的职能更突出¹⁵。不过，考虑到县级领导的个人禀赋数据难以被系统性地获取，因此以地市级城市领导作为考察对象有可能获得更丰富的研究成果。可惜，至今为止以全国各地市级领导为研究样本的实证研究仅有Landry(2003)，姚洋 & 张牧扬(2013)。前者仅以市长为研究对象；后者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¹⁶。不仅如此，我们认为相对于其他市级领导，市委书记是更合适的考察对象，因为：(1)正如上面所言，市级领导干部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当地经济社会事务；(2)几乎所有涉及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都须先经书记办公会和常委会讨论并形成决议，而后才由市长签发执行¹⁷；(3)市委书记大多由市长升任或熟悉经济工作的官员调任¹⁸，而在晋升为该市一把手之后通常都有实施自己发展当

15. 现有组织制度特别强调省部级以上干部的政治职能。比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1994)就特别指出“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领导水平，尤其是政治水平如何，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因此必须成为“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虽然《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1979)首次提出从德、能、勤、绩四个方面考核干部并阐明“考核干部的工作成绩，主要看对现代化建设直接或间接所作的贡献”，但考核主要的对象始终是县级领导。比如，《县(市、区)党政领导干部年度工作考核方案(试行)》(1999)是中组部制定的第一份且可能也是至今为止最明确的干部考核方案。该方案只是明确规定对县委书记和县长等实施年度考核前要由专业部门填写该县(市、区)《社会经济文化主要指标实现情况统计表》。即便中组部试图将该考核方法推广到所有层次的地方政府而颁布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2009)，但仅针对区县提出了“按照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和区县功能定位，重点考核区域经济社会实绩和党建工作实绩”。

16. 值得注意的是：姚洋&张牧扬(2013)在主回归模型中未引入反映经济规模的变量；独特的研究策略导致8年间有效市委书记-市长样本仅有211个，可全国仅地级市和副省级城市就有281个；而且，他们仅仅从年龄、任职年数和是否来自省级机关三个方面来刻画官员个人禀赋。

17. 在这种特殊安排下，若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负面结果，则遭受处罚的往往是(副/助理)省(市/县/区)长而非书记，所以在实证研究中通常都会发现书记的晋升机会要大于其他地方领导。

18. 本文表2的统计数据显示，在2003-2012期间51.38%的市委书记由本市市长升任，14.41%由本省其他市的市长升任。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来自省机关的市委书记，他们之前所从事的大多也与社会经济管理实务相关。另外，若剔除正常退休、犯错误等原因而离任的市

地经济的构想的强烈欲望。总之，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书记意志的表象。

第七，官员职位变动界定通常都太简单，尤其是没有注意到一些特殊年龄（比如市委书记是否年满 57 岁）前后的职位变动在官场中的真实含义。

针对上述缺陷或不足，本文做了一些改进：(1)更详细地界定了官员晋升和降职的各种情形；(2)以地级市（含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的晋升情况为考察对象，且更细致地收集和整理了有关市委书记的个人禀赋并将其作为解释变量引入计量模型；(3)将各市 GDP 全省占比作为影响市委书记晋升的重要解释变量，并考察市委书记的个人禀赋因素是否会通过其任职地这个渠道来影响其晋升机会；(4)以市委书记职位变动（包括续任）年份的前 1 年 GDP 增长率或者前 3 年平均增长率的省内排序作为市委书记的经济增长业绩指标；(5)不仅检验了标尺竞赛假说和锦标赛假说，而且还重点考察了资格赛假说。

三、副省级领导干部的选拔程序与假说的提出

（一）副省级领导干部的选拔程序

1995 年中组部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简

长样本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样本，市长升任市委书记的比例会更高。这就使我们很难相信市长升任市委书记是市其任内经济增长业绩突出的结果。估计正式这个原因导致那些以市长为考察对象的研究未能发现经济增长业绩影响晋升的证据 (Landry, 2003)，甚至干脆在计量模型中就不引入经济增长业绩指标，比如林挺进(2010)。

称《暂行条例》(1995)),而后将之修订为《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简称《条例》(2002)),从而标志着我国形成了一套规范的干部选拔制度。之后,专门针对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选拔,中组部又先后颁布了《关于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2006)(简称《办法》(2006))和《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办法(试行)》(2009)(简称《办法》(2009))。由于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主要是省内的副省级岗位,因此下面以《条例》(2002)为基础并结合其他文件来介绍一下上级组织从市委书记中选拔副省级干部的程序。

一般来说,只有当省党政领导班子换届或者副省级岗位临时出现时,市委书记才有晋升机会。由于副省级干部属于中管干部,因此整个干部选拔工作由中组部来负责组织实施。一般程序是:中组部下派考察组⇒考察组与省委主要领导商讨考察对象人选(的任职条件/推荐范围)和考察工作安排⇒民主推荐会(投票推荐/个别谈话推荐)⇒考察组将民主推荐情况反馈给省党委主要领导⇒省委书记办公会酝酿考察对象人选⇒省常委会讨论表决并提出考察对象建议名单⇒与考察组沟通协商并敲定考察对象⇒考察组与省党委主要成员商讨考察工作方案⇒考察组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民主测评/个别谈话/民意调查/实绩分析→综合评价)¹⁹⇒考察组将考察结果向省委主要领导成员和本人反馈⇒考察组提出拟任人选的初步方案并报中组部⇒中组部党委会讨论决定⇒公示⇒任命(注:若任命涉及政府、人大

19.《办法》(2006)才明确地规定在民主测评阶段需进行“民主调查”和“实绩分析”和“综合分析”。

或政协的岗位，则需人大常委会或政协常委会批准)。在整个过程中，有如下一些细节值得注意：

第一、“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是我国选拔干部的第一原则，而且在选拔省部级以上高级干部时还特别强调对“治党治国”政治能力的考察²⁰。一般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规模越大，人口越多，社会经济关系就越复杂，从而对地方领导人驾驭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那些任职于GDP全省占比高的市的市委书记最容易被评价为具治党治国的潜在政治能力，因为：一则，那些GDP占比高的市对全省经济社会的影响很大，因此上级政府一般会把信得过且有能力的干部派去担任市委书记；二则，如果在任上未发生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或者较好地处理了各种复杂问题，则该市委书记就显示其已具备了良好的政治能力。

第二、长期以来组织部门并未明确地把经济增长业绩作为干部提拔的依据²¹。即便《办法》(2006)开始明确规定在民主测评阶段必须有实绩分析环节，但经济增长业绩仅是众多实绩分析项目中的一项²²。

20.《办法》(2009)对拟提拔人选考察对象的民主测评内容做了最清晰和完整的规定，即：德（党性修养、理论素养、坚持原则、道德品质），能（工作思路、组织协调、依法办事），勤（精神状态、工作作风），绩（履行职责成效、解决复杂问题、基础建设）和廉（廉洁自律）等方面的情况。

21. 虽然中组部在1979颁布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实行干部考核制度的意见》中就提到“考绩，是考核干部的工作成绩，主要看对现代化建设直接或间接所作的贡献”，但并未给出“贡献”的测度和评价方法。即便《地方政府工作部门领导干部年度考核方案(试行)》(1988)开始要求在县级领导干部的年度考核中需专业部门填写该县(市、区)《社会经济文化主要指标实现情况统计表》，但中组部在实施该方案的《若干说明》中又特别指出：“这种考核不能代替上级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其他类别的考核，如提名选举前的考核、推荐任命前的考核等”。这似乎意味着，组织部门有意避免将干部的一般（经济增长）业绩考核等同于人事选拔考核。

22. 由于《办法》(2006)的网上版本缺失“附表”，因此在此以《办法》(2009)为例。《办法》(2009)规定了实绩分析和民意调查的内容为工作思路、工作投入、工作成效、履行职责、

不仅如此，民主测评和民意调查的参与者最终只被要求综合数量众多的考核指标而给予考察对象一个抽象的总体评价并回答“是否同意其被提拔使用”。因此，考察对象不太可能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业绩原因而遭到大量的负面评价，除非他在发展当地经济方面太不作为而引起普遍不满²³。换句话说，除非辖区经济增长率的省内排序太靠后，否则市委书记就不会因为经济增长业绩原因而被排除在晋升候选人范围之外。

第三、尽管《条例》规定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的结果应当成为选拔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条例》还特别强调“防止简单地以票取人”²⁴。因此，那些由民主推荐程序而产生的考察对象无法通过民主测评，尤其是因经济增长业绩不够靓丽而无法通过民主测评的情况几乎不会发生，何况参与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的人员基本一致²⁵。可见，

工作作风和公众形象等；同时要求参照附表三《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实绩分析、民意调查评价要点》来对上述内容进行评价。可在附表三中“经济发展”仅是实绩分析的6个大项中的一项，而在26个小项中与经济增长率密切相关的可能只有“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收入水平提高，人居环境改善”和“扩大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4项。

23. 在与涉及多个省的官员的深入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若一个市县的经济增长率连续两三年都排在全省倒数1-2位，则对市（县）主要领导，尤其是市（县）长来说，肯定是一个严重的政绩污点而不利于晋升；除此之外，经济增长业绩对晋升似乎没有必然联系。与之类似，姚洋 & 张牧扬(2013)也仅仅宣称他们的调查发现“得分最低的官员将面临下岗” (p.138, 脚注1)。

24. 针对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沦为一种形式，时任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2010年中央党校全国地委组织部部长培训班开班典礼上特别指出“要高度重视推荐票、测评票的含金量，不要让测评和推荐成为一种形式”。然而，这又导致在干部选拔过程中有人故意做票，因此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特别指出“要完善工作机制，推进干部工作公开，坚决制止简单以票取人的做法，确保民主推荐、民主测评风清气正”。

25 按规定参与民主推荐投票、个别谈话、民主测评的人员范围是：省党委成员、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成员、纪委领导成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党委工作部门、政府工作部门、人民团体的主要领导成员、下一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领导成员以及担任过本级领导职务的老同志。不过，实际参与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尤其是个别谈话的名单却是由省委主要成员与考察组讨论确定。

一个市委书记是否能否得到晋升，关键在于其是否能够通过民主推荐为民主测评的考察对象，而不是他是否能够通过民主测评。

第四、与省级领导晋升不同，在选拔副省部级干部的过程中，享有实际提名权的人员涉及多个层次。首先，由于《条例》(2002)在选拔任用条件中还特别规定“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还应当努力达到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各项要求”²⁶，因此，那些被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其他重要国家领导人相中的候选人将在晋升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其次，由于整个选拔和任命工作是由中组部直接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因此，中组部主要领导对副省部级领导的人选也具有重大发言权。另外，《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因此省委往往会积极地提出自己的选拔对象建议名单，以便在干部选拔活动中掌握主动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省委书记掌握着书记办公会和党委会的议事权而对省委的选拔对象建议名单的形成最具影响力，但他也必须给予其他重要省委常委（比如，省长-副书记，专职副书记）一定的提名权，毕竟重要的人事决定必须经省党委常委会民主表决且多数人同意。总之，上述人员相互博弈而形成的候选人一般都能顺利通过民主推荐程序，何况《条例》要求“对不同职务层次人员的推荐票分别统计”。然而，享有实际提名权的人员的多层次特征使得我们很难像 Opper & Brehm(2007)那样构建市委书记的政治关系指数，而且无法模仿Jia等人(2013)在计量模型中引入政治关系与经济业绩的交叉项。

26. 《暂行条例》(1995)的相关表述是：“省部级党政领导干部，还应当努力达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对高级干部提出的五项要求”。

第五，每次人事调整所释放的晋升机会有限，晋升竞争通常很激烈。尽管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的具体结果（比如得票数）并不公开，但得票过低仍然会对提拔造成负面影响。这就迫使那些享有实际提名权的各方都避免将那些人品、口碑、能力和经济增长业绩表现欠佳的市委书记作为自己的提名对象，何况提名者也希望被提名者有能力增进自己的政治业绩和影响力。

（二）各种可供检验的假设

根据对组织部门选拔副省级干部过程的介绍，我们提出如下可供检验的假设：

假设 1：“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原则使得某些市委书记可以不依赖于经济增长业绩而获得晋升，甚至可以在较短的任职内得到破格晋升。

假设 2：在市委书记之间不可能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标尺竞赛，即以经济增长率及其排序为测度的经济增长业绩与市委书记晋升机会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假设 3：在市委书记之间不可能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锦标赛，即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N=n$ 的市委书记与其他市委书记相比未必享有更多晋升机会，其中 n 表示可晋升的岗位数。

假设 4：在市委书记之间可能存在一个比较宽松的基于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的晋升资格赛，即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N(\gg n)$ 的市委书记可能比其他市委书记享有更多的晋升机会，其中 n 表示可晋升的岗位数。

假设 5：那些任职于 GDP 全省占比高的市的市委书记在晋升竞争中享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因为他们最有可能被认为具有“治党治国”的能力。

假设 6：具有某些特殊个人禀赋的干部更有可能被派到 GDP 占比高的城市担任市委书记。

总之，在满足上述 6 个假设的晋升机制下，不但上级组织，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威能够得到维护，而且还能够激励地方官员努力提高本辖区的经济增长率，尽管在事后晋升竞争中经济增长业绩未必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因为：一则，由于享有实际提名权的人员众多且每个提名人在一省可能有多个关系比较密切的市委书记，因此，除了少数市委书记之外，大多数市委书记在事前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在晋升竞争中到底具有多少优势地位，从而需要通过事先发展本地经济来显示能力和对上级的忠诚；二则，更重要的是，即便基于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名的资格赛尺度很宽松，但每个市委书记在事前并不能保证自己辖区的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名足够靠前而不至于丧失参加晋升竞争的资格，哪怕他能预估本辖区经济增长率不会太低。结果，宽松的晋升资格赛促使大多数市委书记都必须在任期内努力发展本地经济，而他们在事后却无权去左右那些掌握实际提名权的人员如何行使提名权以及这些人员之间的相互博弈过程，以至于中央和上级组织能够保持足够的权威。

四、变量定义

（一）对晋升、平调和降职的定义

由于中国官员的行政级别与实际权力之间的匹配关系非常复杂，因此我们认同陶然等（2010）的观点，即在界定中国官员职位的升降时，一个虽有代价但却比较稳妥的做法就是按照一个明确的规则来严格定义职位变动，尽力避免主观随意。鉴于此，除了下述特殊情况外，本文将以正式的行政级别变化来定义晋升（ $y=1$ ）、平调（ $y=0$ ）和降职（ $y=-1$ ），而且不区分相同行政级别的党务部门和行政部门。

1、省委常委。由于市委书记几乎不可能直升任中央副部级以上职务，因此最看重的职位莫过于省委常委²⁷。即便是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若先前不是省委常委而获得了省委常委身份，也被视为晋升，尽管其行政级别未发生变化；反之，若先前拥有省委常委身份的市委书记失去了省委常委身份，则被视为降职，哪怕他们可能获得了副省长、人大副主任或者政协副主席等副部级职位。

2、非省委常委的副省长²⁸。省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常务副省长一般不能由市委书记直接升任，且省人大主任和政协主席通常分别由省委书记和重要的（前）省委常委担任。因此，在省级政府中，除了省委常委外，次重要的职位就是非省委常委的副省长²⁹。事实上，

27. 省常委会通常有 11、13 或 15 个席位。书记（通常兼省人大主任）、省长（兼副书记）、专职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和省军区司令员是天然的省常委。除此之外，排名第二的副省长、个别重要地市的市委书记和强势厅局（发改委、财政厅、教育厅等）的正职领导也有可能是省常委。其中，省委书记、省长、省军区司令都不可能直接来自市委书记，除非此前兼任副书记或副省长。

28. 虽有例外，但“一正八副”的正、副省长配置为常规安排，且常务副省长被省委常委兼任。

29. 在我们收集的数据中，市委书记市长直接升任省人大政协正职的案例，在 2004-2010 年间仅有一例。

即便有些市委书记，比如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已是副部级官员，甚至省委常委，但他们也不太可能跨越副省长的任职经历而直接升任省委书记、省长以及中央正部级以上领导，因为《条例》(2002)规定提任正职之前应当有两年以上的副职经历。因此，若市委书记调任副省长，则被视为晋升，除非他们失去了先前的省委常委身份。

3、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若省会城市不是副省级城市，则其市委书记自然要比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的行政级别低半级。不过，即便有些省会不是副省级城市，但其在省内地位非常特殊。因此，若普通地市的市委书记调任省会城市担任市委书记或者市长，则视为晋升；反之，若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调任其他普通市委书记，则视为降职。

4、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在中国，市委书记调任省或者地人大政协，以及各级顾委、巡视组或当地企业学校，通常都被视为降职。不过，市委书记调任省人大副主任和政协副主席的情况比较特殊。一方面，相对于掌握实权的市委书记，它们确实是无实权的虚职；另一方面，它们毕竟是副部级职位，因而是那些即将退居二线的市委书记极力追求的职位³⁰。按惯例，在换届时，若某市委书记已满 57 岁，则一般不会被安排连任或平调其他地市；若未满 57 岁，则可被安排再任一届直至 60 岁卸任。鉴于此，若年龄未满 57 岁的市委书记被调往省人大政协任副职，则很可能是上级对其当前政绩不满，故视

30. 一般来说，省人大有 2-3 位副主任，省政协有 5-6 位副主席。然而，一个省平均有 11-15 个常委，若干非常委副省长，省长助理，十几个地级市和二三十个厅局部门以及其他数量众多的正厅级单位。即使每年每个部门退居二线的人数有限，但加总起来也远远超过省人大政协副职 9 个的数目。

为降职；反之，若年龄大于 57 岁的市委书记在换届时被调任省人大政协副职，则视为晋升。

5、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和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由于这两个职位位居中枢，且通常享有正厅级待遇，因此，若普通的市委书记调任这两个职位，则本文视为平调。

6、市委书记调任市长。虽然市委书记和市长行政级别相同，但市委书记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因此，除非是普通市委书记调任副省级城市或省会城市担任市长，否则都视为降职。

（二）关于上任、离任与任职时间的确定

由于市委书记的上任对该市政府行为产生影都需要时间，因此我们沿用 Bo (1996) 的规定，即：若市委书记上任发生在 1~6 月，则该年的经济表现记为其经济增长业绩且该年被视为其任期的起始年；若上任发生在 7~12 月，则该年的经济表现不记为其经济增长业绩且将下一年记为其任期的开始年。不过，与 Bo(1996)不同的是，无论一个市委书记在某年的何时离任，该年的经济表现都不是其可被观察的经济增长业绩。理由很简单：即便离任发生在 12 月 31 日，该年的各种经济指标都未被正式统计并公布出来，因此无法成为上级组织考核市委书记经济增长业绩并以此作为奖惩的依据。比如，某市委书记在 2003 年 6 月 30 日之前（7 月 1 日之后）上任，该年被（不被）视为其任期的开始年。他的第一条人-年样本出现在 2004 年，任职时间 $T=1$ 年（0 年），经济增长业绩为 2003 年的经济增长（无经济增长业绩记录）；到了 2005 年， $T=2$ 年（1 年），经济增长业绩为 2003 和 2004 年

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业绩为 2004 年经济增长）；...到了 2007 年 12 月 31 日，该市委书记晋升为副省长，则其任期结束， $T=4$ 年（3 年），经济增长业绩为 2003(2004)~2006 年的经济增长。需要说明的是，在每条人-年样本中，不仅有市委书记上任的年份，而且还以 0-1 哑变量来区分 6.30 之前到任和 7.1 之后到任。

另外，我们采取两种方法来衡量委书记的任职时间：(1)仅仅计算其担任市委书记的年数，但用哑变量来标示市委书记是否由本市市长升任；(2)若市委书记是由本市市长升任，则市委书记的任职时间从其担任市长算起。不过，考虑到市委书记才是本级政府真正的一把手，因此我们主要采用第一种方法，而把第二种方法放在稳健性检验中。

再次，关于过渡性质职务的取舍。官员调动时难免碰到目标职位暂不空缺的矛盾，更考虑到官员调动命令与人大、党代会最终任免之间的时间差，因此，官员在就任目标职位之前可能担任一个过度性职务。另外，若官员在一个新职位上担任时间很短就被解职或者降职，则很有可能是源于一些非本文所关心的因素（比如，违法乱纪、疾病）。鉴于此，本文在计算市委书记的任职时间和来源去向时，不计任职时间不到一年的职务。

（三）基于 GDP 增长率的省内排序

为了检验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锦标赛假说，本文分别以前 1 年经济增长率(g_1)或前 3 年移动平均经济增长率(g_3)的省内排序来测度市委书记的经济增长业绩。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特定年份 t 存在一些市委书记的任职时间 $T < 3$ ，甚至 $T = 0$ ，因此在对市委书记的经

经济增长业绩省内排序之前，需要对这些市委书记“前1年经济增长率”和（或）“前3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做一些特殊处理。第一，对于那些在 t 年任职时间 $T=0$ 年的市委书记样本，以该地级市 $t-1$ 年经济增长率作为其虚拟的“前1年经济增长率”和“前3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第二，对于任职时间 $T=1$ 年（或2年）的市委书记，前3年平均经济增长率= $t-1$ 年（或者 $t-1$ 和 $t-2$ 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

（四）其他可能影响市委书记晋升的变量

除了经济增长率分组排序这个经济增长业绩指标之外，官员的一些个人禀赋（比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经历等）和任职所在地的禀赋条件（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区位等）也可能影响官员的晋升。参照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引入了如下一些变量。

1、年龄、党龄和工龄。统计分析发现，这三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很大。为规避多重共线性并结合本文分析问题的实际，在年龄、党龄和工龄三者中只取年龄。另外，正如前面所言，换届时是否年满57岁会严重地影响市委书记的政治命运。因此，本文引入“年龄是否 ≥ 57 岁”的虚拟变量，即57岁及以上为1，否则为0。

2、性别与民族。虽然多年提倡使用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但在我们整理的数据库中，女性和少数民族市委书记分别只占4%和5%，且后者主要布在样本省区中的内蒙和广西。我们的实证研究也发现这两个因素与市委书记晋升之间无显著关系，因此为消除其对整体统计的干扰，故在下面的实证回归中舍弃这两个变量。

3、受教育程度和所学专业。不少实证研究都发现官员的受教育

程度和所学专业会对其仕途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也收集了市委书记的相关信息。虽然区分官员的最后学历和学位是否是通过函授、党校等在职学习方式获得具有重要意义，但限于信息的可获得性而只能简单地识别其最终学历及其专业。在此，我们设定两个虚拟变量：是否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是为 1，否为 0；是否是理工农医专业，并令 1=理工农医，0=人文社科。

4、工作经历。已有实证文献发现，如下一些工作经历会影响官员的晋升(Li & Bachman, 1989; Oppen & Brehm, 2007; 林挺进, 2010): (1)担任过秘书长、秘书、办公室主任或者高级领导的个人助理；(2)在共青团乡镇委员会及以上的团组织工作经历；(3)在乡镇及以上政府组织人事部门工作经历；(4)在宏观经济部门或国有大中型企业等经济部门工作经历。鉴于此，本文设定四个虚拟变量来刻画市委书记是否具有上述工作经历(有为 1，否为 0)。

5、当地禀赋的控制变量。本文使用该辖区前 1 年 (t-1) 的 GDP 的全省占比来刻画该地市在全省经济中的重要程度，而使用前 1 年辖区的人均 GDP 来刻画该地市绝对的经济水平。此外，我们还使用前 1 年非农产业占比来反映该地市的经济结构，但该变量和前 1 年度地方人均 GDP 的相关系数达 0.657 且实证结果不显著，故舍弃。事实上，我们还尝试过有辖区人口和人口的省内占比作为解释变量，但回归结果的稳定性和显著性不及 GDP 全省占比，故也未引入下文的回归分析中。

6、省内地级市数量。由于省委常委和副省长席位在各省之间并

无显著差别，因此各省地级市的数量直接会影响到市委书记晋升的概率。

此外，本文采用省区虚拟变量控制省区效应，使用年度虚拟变量控制年份效应。

五、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以 2003~2012 年间全国 20 个省份下辖的 15 个副省级城市和 245 个地级市、地区、

盟、自治州（为方便行文而将它们统称为“城市”或者“市”）的书记的职位变动作为考察对象³¹。关于市委书记个人信息的原始数据来自于人民网、新华网的领导简历；经济数

表 1 2003~2012 年间市委书记的来源去向

来源	人次	比重	去向	人次	比重
本市升	428	51.38%	本市升	0	0.00%
本省外市升	120	14.41%	本省外市升	10	1.20%
外省外市升	2	0.24%	外省外市升	3	0.36%
省内平调	86	10.32%	省内平调	85	10.20%
省外平调	3	0.36%	省外平调	3	0.36%
中央机关	2	0.24%	中央机关	14	1.68%
本省机关	186	22.33%	本省机关	304	36.49%
外省机关	2	0.24%	外省机关	24	2.88%
其他	4	0.48%	退居二线	165	19.81%
			在任	212	25.45%
			其他	13	1.56%
合计	833	100%	合计	833	100%

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总共形成了 2600 条“市委书记-年”样本。不过，一些无法确定离职原因（包括：病故、

31. 四个直辖市的下属区县的行政级别存在差异且缺失部分区县的经济数据；西藏、新疆、青海、云南和贵州缺少一半以上地市的经济数据；海南和宁夏的地级市太少，分别为 2 和 5 个，故都被剔除。在余下的 20 个省份中本来有 15 个副省级市和 253 个地级市，其中广东省的城市数最多（21 个市），吉林省最少（8 个市），各省平均有 13.4 个城市。不过，仍然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级市的经济数据或市委书记个人数据缺失，故本文有效的样本来自 245 个市。

违纪撤职、去向不明等，共计 8 人次) 的市委书记不在下文计量分析的范围内。另外，2003~2004 年一些边远地区的经济数据和市委书记个人数据缺失而在计量分析过程中被 stata 程序自动剔除掉了。

根据上任前的任职背景，市委书记有多种来源：(1)本市晋升；(2)本省外市晋升；(3)外省外市晋升；(4)省内平调（地市级职务）；(5)省外平调（地市级职务）；(6)来自中央；(7)来自本省机关；(8)来自外省机关；(9)其他（大学、企业等）。同时，市委书记离任后的去向可分为 11 种情况：(1)本市晋升；(2)本省外市晋升；(3)外省外市晋升；(4)省内平调（地市级职务）；(5)省外平调（地市级职务）；(6)调入中央；(7)调入本省机关；(8)调入外省机关；(9)退居二线；(10)在任；(11)其他（病故、违纪撤职等）。

表 1 显示，98.44% 的市委书记来自于本省，其中 51.38% 直接由本市市长升任，而 14.41% 和 10.32% 分别由本省外市市长升任和市委书记平调，22.33% 来自本省省级党政机关。同时，市委书记离任后的主要去向也在省内，其中 36.49% 调入本省党政机关，10.20% 平调到本省其他市，并有 19.81% 就此终结了政治生涯或退居二线。由此可见，市委书记的晋升竞争基本上是发生在本省同行之间。另外，尽管总共有 44 位市委书记调往中央和外省，占比为 5.28%，但并未集中发生在个别省份，其中广东和陕西涉及人数最多（各 5 位），江苏等 8 省各有 3 位。本文也尝试引入区域哑变量（比如上述 10 省份为 1，其余省份为 0）但回归结果不显著，故被放弃。

表 2 统计了 2003~2012 年间各省各年获得晋升的市委书记人数。

统计显示：一
个省在某一
年发生市委
书记晋升的
人次为 0、1、
2、3、4、5、6
的省-年样本
数分别为 75、
58、40、15、8、
3、1。在晋升
人数非 0 的省
-年样本中，晋
升人数为 1、2
(和 3) 的省-

年份: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合计 (S)	城市数 (N)	S/N
河北	1	1	1	3	1	2	0	1	2	1	13	11	1.18
山西	3	0	1	0	0	1	1	1	1	2	10	11	0.91
内蒙	3	0	2	1	0	1	0	1	3	0	11	9	1.22
辽宁	0	0	2	1	1	2	1	3	2	1	13	14	0.93
吉林	0	1	0	0	2	0	0	0	2	0	5	8	0.63
黑龙江	1	0	0	0	1	1	1	1	1	2	8	12	0.67
江苏	6	2	0	2	1	2	2	0	4	2	21	13	1.62
浙江	1	1	0	0	1	1	0	2	1	2	9	11	0.82
安徽	5	0	2	0	0	3	0	0	1	0	11	17	0.65
福建	2	0	4	0	0	2	1	0	0	0	9	9	1.00
江西	2	0	0	1	1	0	0	1	4	0	9	11	0.82
山东	0	1	0	4	4	2	0	2	3	2	18	17	1.06
河南	5	1	1	3	0	4	0	3	2	3	22	17	1.29
湖北	2	1	1	2	1	4	0	0	3	3	17	12	1.42
湖南	0	0	0	2	1	3	0	0	2	0	8	13	0.62
广东	0	0	1	5	3	2	0	2	4	1	18	21	0.86
广西	2	1	0	0	1	2	1	0	2	0	9	14	0.64
四川	1	0	0	0	2	0	1	0	2	1	7	18	0.39
陕西	2	0	1	3	1	1	0	0	2	1	11	10	1.10
甘肃	0	0	1	1	0	1	0	0	2	2	7	12	0.58

年样本占比为 78.4% (90.4%)。这意味着，若真的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锦标赛，则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2 名，或至少前 6 名的市委书记应该比其他市委书记享有更多的晋升机会。遗憾的是，我们为未找到相关证据。另外，表 2 也显示，地级市数量多的省份，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并不会减少；或者，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与省内地级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数量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系统的负相关性。不过，江苏的市委书记晋升机会远远大于其他省，而四川的市委书记晋升机会

最小。这些现象可能与各省的政治传统有关系。

现在,再来看
看市委书记发生
职位变化在任职
时间上的分布情
况(见表3)。虽
然按照中国现行

表3 不同任职时间内市委书记职位变动情况

(样本范围: 20个省份的市委书记)

	职位变动		晋升		平调		降职	
	人次	占比	人次	占比	人次	占比	人次	占比
T≤1	86	13.7%	30	12.5%	33	13.6%	23	15.9%
T=2	116	18.5%	46	19.2%	52	21.4%	18	12.4%
T≥3	426	67.8%	164	68.3%	158	65.0%	104	71.7%
合计	628	100%	240	100%	243	100%	145	100%

制度安排,一届政府的任期是5年,但2003~2012年间260个市却发生了628人次的市委书记职位变动,其中竟然有202人次(约32%)是发生在任职时间T≤2(即不足3年)的期间,而这其中又有76人

次得到晋
升,约占
10年间总
共240晋
升人次的
37.7%,甚
至还有30
位市委书
记在上任
之后的第
二年就得

表4 2003~2012年间市委书记个人禀赋情况的描述统计

变量	Obs	Mean	Std. D.	Min	Max
年龄(岁)	2560	52.58	3.74	40	61
是否≥57岁(1=是, 0=否)	2600	0.17	0.37	0	1
大学及以上学历(1=是; 0=否)	2600	0.95	0.22	0	1
任职时间(合并市长任职时间)	2553	3.66	2.33	0	13
来自省或中央(1=是, 0=否)	2600	0.23	0.42	0	1
市委书记任职时间	2558	2.38	1.72	0	10
是否是原市长(1=是, 0=否)	2553	0.47	0.50	0	1
民族(1=汉; 0=少数民族)	2559	0.95	0.21	0	1
性别(1=男; 0=女)	2566	0.97	0.17	0	1
省籍(1=本省; 0=外省)	2531	0.73	0.45	0	4
专业(1=理工农医; 0=人文社科)	2452	0.16	0.37	0	1
共青团工作经历(1=有, 0=无)	2512	0.36	0.48	0	1
有无秘书经历(1=有, 0=无)	2512	0.53	0.50	0	1
组织部门工作经历(1=有, 0=无)	2512	0.20	0.42	0	7
经济部门工作经历(1=有, 0=无)	2510	0.38	0.49	0	1
省内地级市数量	2600	13.86	3.53	8	21

到了晋升。显然,这些市委书记的晋升不太可能是源于其任职期间突

出的经济增长业绩，因为从制定和实施地方发展策略到这些策略发挥作用至少也需要 2~3 年时间³²。显然，这为假设 1 提供了证据，即在“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原则下，某些有特殊政治才能的市委书记可能并不依赖经济增长业绩而得到提升，甚至破格提升。

最后，关于市委书记的个人禀赋情况的统计分析见表 4。统计显示，(1)在 2003~2012 年，市委书记年龄区间是 40~61 岁，平均年龄 52.58 岁；(2)关于市委书记的任职时间，若仅计算市委书记本身而不含市长的任职时间，则市委书记任职区间为 0~10 年，平均任职时间 $T=2.38$ （或者 3 年多但不足 4 年）；(3)关于市委书记的学历，其中以硕士最多，本科次之，博士再次，专科以下最少，同时高学历的比例有显著的上升趋势；(4)截止 2012 年末，只有 16.92% 的市委书记的最终学历专业是理工农医，而大部分官员的专业是人文社科；(5)2003~2012 年期间有过共青团、秘书、组织部门和经济部门工作经历的市委书记的人次占比分别为 34.85%、51.08%、24.69%、34.92%。

六、计量分析及其结果

本文对各主要解释变量进行相关系数矩阵分析后发现，除了“担任市委书记前是否担任本市市长”与“是否来自省级机关”的相关系数为 -0.5839 外，其他系数都很小，且绝对值普遍不大于 0.1。因此，

32.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最常用的手段是廉价出让工业用地来招商引资。根据中国土地市场网 (<http://www.landchina.com>) 提供的每宗工业用地的出让信息，我们可知，即便政府成功地出让了工业用地，但企业通常还需要 2~3 年时间来来进行工厂建设，而后才能形成真正的生产经营能力。

可认为它们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与大多数文献一样，下面我们将采用 **Order Probit** 模型来进行实证检验辖区经济增长率排序对地市级官员晋升的影响，即

$$y_i = \begin{cases} -1 & \text{if } y_i^* \leq \gamma_1 \\ 0 & \text{if } \gamma_1 < y_i^* \leq \gamma_2 \\ 1 & \text{if } y_i^* > \gamma_2 \end{cases}$$

其中， y_i^* 为上级组织对市委书记政绩的考核值； y_i 为上级组织对市委书记职位变动的决定； γ_1 和 γ_2 为两个对应的阈值。

（一）市委书记-年全样本的计量分析

参照多数文献，我们首先以全部有效的市委书记-年样本作为考察对象，但不包含：(1) 去向不明的市委书记离任当年的样本，(2) 2003~2004 年市委书记个人信息和经济数据缺失的市委书记-年样本；(3) 任职时间 $T=0$ 的市委书记-年样本，因为即便这些市委书记的职位发生变化也与其发展当地经济的业绩无关。相关的回归结果见表 5。

由于经济增长率不仅是现实中最常用的经济增长业绩指标而且其回归结果在 Li & Zhou(2005)等文献中也最稳健，因此首先分别以前 1 年经济增长率 (g_1) 和前 3 年平均经济增长率 (g_3) 作为市委书记的经济增长业绩指标。遗憾的是，在 1~3 列中前 1 年和前 3 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其中在第 1 列中将 **GDP** 全省占比从解释变量中剔除。随后，我们又在 4~5 列中以前 1 年和前 3 年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作为经济增长业绩指标，但回归系数同样不显著。事实上，在

采取各种限制样本范围的措施之后，该结论都非常稳定（参见表 11）。这说明，在市委书记-年的全样本中，无有效证据来支持晋升标尺竞赛假说。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是否有证据支持晋升锦标赛假说。为此，我们分别以前 1 年和前 3 年经济增长率是否省内排前 N 名来作为测度经济增长业绩的哑变量（是为 1，否为 0）。由于一个省一年获得晋升的市委书记人数 n 通常不超过 2，因此在 6~7 列报告了 $N=n=2$ 的回归结果。事实上，无论 $N=1、2、3$ 或 4，这些哑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见表 6）。可见，在市委书记-年的全样本中也没有证据支持晋升锦标赛假说。

不过，上述结论并不能排除经济增长业绩对晋升有影响的可能性，因为晋升竞争还有可能是基于经济增长率排序的资格赛。我们令 $N=4, 5, \dots, 12$ 并重复表 5 第 6~7 列的计量分析过程。相应的回归结果见表 6。遗憾的是，仍然没有一个哑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市委书记-年的全样本中，我们也没有找到支持资格赛的证据。

由此可见，至少在市委书记-年的全样本中没有证据来支持市委书记之间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竞赛的假说。另外，表 6 还显示：

表 5 以任职时间 $T \geq 1$ 的市委书记-年样本为考察对象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	-----	-----	-----	-----	-----	-----

	g_1	g_1	g_3	g_1 排序	g_3 排序	g_1 排前2	g_3 排前2
增长业绩	0.0032 (0.0072)	0.0017 (0.0072)	-0.0107 (0.0107)	0.0005 (0.0077)	-0.0015 (0.0075)	-0.0854 (0.0852)	-0.0801 (0.0851)
GDP 占比		3.186*** (0.566)	3.223*** (0.566)	3.190*** (0.566)	3.210*** (0.568)	3.195*** (0.564)	3.207*** (0.565)
人均 GDP	0.0969*** (0.0235)	0.0287 (0.0264)	0.0293 (0.0265)	0.0288 (0.0266)	0.0277 (0.0268)	0.0315 (0.0268)	0.0310 (0.0267)
年龄	-0.0303*** (0.0105)	-0.0369*** (0.0105)	-0.0366*** (0.0106)	-0.0368*** (0.0105)	-0.0366*** (0.0106)	-0.0367*** (0.0106)	-0.0367*** (0.0105)
≥57 岁	-0.515*** (0.127)	-0.531*** (0.128)	-0.536*** (0.128)	-0.532*** (0.128)	-0.525*** (0.129)	-0.534*** (0.128)	-0.535*** (0.128)
≥大学	0.0685 (0.194)	0.0279 (0.196)	0.0203 (0.195)	0.0260 (0.196)	0.0335 (0.197)	0.0253 (0.195)	0.0303 (0.195)
专业	0.161* (0.0870)	0.149* (0.0874)	0.154* (0.0876)	0.150* (0.0876)	0.145* (0.0877)	0.154* (0.0874)	0.154* (0.0870)
本省籍	-0.0583 (0.0707)	0.0033 (0.0713)	0.0084 (0.0714)	0.0040 (0.0714)	0.0031 (0.0718)	-0.139 (0.0883)	-0.140 (0.0880)
任职时间	0.0478** (0.0244)	0.0557** (0.0249)	0.0570** (0.0249)	0.0560** (0.0249)	0.0555** (0.0248)	0.0568** (0.0249)	0.0560** (0.0248)
原市长	-0.113 (0.0719)	-0.0843 (0.0737)	-0.0844 (0.0737)	-0.0841 (0.0737)	-0.0816 (0.0739)	0.00675 (0.0713)	0.0077 (0.0712)
省或中央	-0.0907 (0.0886)	-0.133 (0.0883)	-0.139 (0.0885)	-0.134 (0.0882)	-0.132 (0.0887)	-0.0835 (0.0736)	-0.0841 (0.0737)
共青团	0.152** (0.0701)	0.116 (0.0710)	0.119* (0.0711)	0.116 (0.0710)	0.113 (0.0710)	0.118* (0.0713)	0.118* (0.0713)
秘书经历	0.0527 (0.0652)	0.0541 (0.0659)	0.0555 (0.0659)	0.0543 (0.0659)	0.0568 (0.0661)	0.0543 (0.0658)	0.0539 (0.0658)
组织部门	0.102 (0.0764)	0.113 (0.0762)	0.111 (0.0761)	0.112 (0.0761)	0.109 (0.0763)	0.113 (0.0761)	0.112 (0.0762)
经济部门	-0.0029 (0.0661)	-0.0063 (0.0663)	-0.0038 (0.0665)	-0.0056 (0.0664)	-0.0114 (0.0664)	-0.0006 (0.0666)	-0.0021 (0.0665)
城市数量	0.0069 (0.0154)	0.0338* (0.0160)	0.0317** (0.0160)	0.0333** (0.0164)	0.0345** (0.0164)	0.0322** (0.0160)	0.0329** (0.0159)
切点 1	-2.783*** (0.687)	-2.746*** (0.703)	-2.941*** (0.712)	-2.772*** (0.688)	-2.755*** (0.688)	-2.790*** (0.690)	-2.774*** (0.688)
切点 2	0.258 (0.684)	0.327 (0.702)	0.133 (0.710)	0.300 (0.687)	0.318 (0.687)	0.286 (0.689)	0.301 (0.687)
省效应	Yes						
年份效应	Yes						
观测数	2,059	2,059	2,060	2,059	2,053	2,062	2,062
对数似然比	-1089.4	-1089.15	-1089.16	-1040.89	-1037.80	-1040.89	-1040.95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系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1%、5%和 10%的检验。下同。

第一,虽然在第 1 列中人均 GDP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可一旦

将 GDP 全省占比同时作为解释变量放入计量模型之后，前者的回归系数就不再显著了而后者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注：该现象在所有的情况中都存在）。这意味着，相对于经济增长业绩和人均 GDP，市委书记任职地的 GDP 全省占比对他们的晋升具有更重要的影响。

第二，“任职时间”的回归系数始终为正且在 5%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市委书记在任时间越长，晋升的机会也会增加。不过，年龄和“是否≥57 岁”的回归系数为负且在 1%水平上显著，尤其是后者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都大于 0.5。这又表明，市委书记的年龄，尤其是年龄是否≥57 对市委书记的仕途有巨大的负面作用，甚至构成一票否决。

第三，“专业”的回归系数非常稳定地为正且在 10%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市委书记的所学专业为理工科，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晋升机会。

表 6 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N 的哑变量设置及其回归结果
(市委书记-年样本范围：任职时间 T>0)

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N 为 1，否则为 0											
N	g_1	g_3	N	g_1	g_3	N	g_1	g_3	N	g_1	g_3
N=1	-0.061	-0.207*	N=4	-0.006	-0.050	N=7	0.036	0.074	N=10	0.097	0.110
	(0.117)	(0.117)		(0.068)	(0.068)		(0.064)	(0.065)		(0.076)	(0.075)
N=2	-0.085	-0.080	N=5	-0.009	0.061	N=8	0.043	0.089	N=11	0.020	0.075
	(0.085)	(0.085)		(0.065)	(0.065)		(0.068)	(0.068)		(0.087)	(0.085)
N=3	-0.046	-0.117	N=6	0.022	0.057	N=9	0.051	0.081	N=12	-0.018	0.045
	(0.073)	(0.073)		(0.064)	(0.064)		(0.071)	(0.071)		(0.100)	(0.095)

注：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5 第 6~7 列极其相似，故未列出。

第五，除了“共青团工作经历”在第 1、3、6 和 7 列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之外，其他工作经历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或者说，在全

样本分析中，我们仅仅能推断共青团工作经历对市委书记的晋升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第六，与晋升锦标赛假说的预测不同，“省内地级市数量”的回归系数始终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即一个省份下辖的地级市数量越多，不仅不会减少每个市委书记晋升机会，反而还会显著地增加晋升机会。一个猜测性解释是，在那些地级市数量较多的省份，相对于省直机关的领导，市委书记群体的谈判力更强，以至于在省级层面会留给市委书记更多的晋升岗位。

（二）限制样本范围的计量分析

由于在市委书记-年的全样本中可能包含了太多噪音而干扰计量结果，因此有必要限制样本的范围。为此，我们分如下步骤对样本进行了限制。

第一步，由于我们在分析中发现“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10”是一个重要的排序分割点，因此现在将样本限制在地级市城市数量 >10 的省份中。这意味着，福建（8 个地级市+1 个副省级城市）、吉林（7 个地级市+1 个副省级城市）、内蒙（9 个地级市）和陕西（9 个地级市+1 个副省级城市）的样本将被剔除。重复表 5 和表 6 的计量分析过程且结果极其相似，故不再单独报告。

第二步，剔除任职时间 ≤ 2 年的市委书记-年样本。倘若上级组织真的会根据市委书记发展本地经济的业绩来决定其仕途，那么，上级组织一定要给市委书记足够长的任职时间来实施其发展经济的计划。

虽然我们可以推断那些任职不足 3 年的市委书记所发生的职位变动不太可能是上级组织根据其经济增长业绩所做出的人事决定，但这并不能排除那些任职 3 年以上的市委书记所发生的职位变动确实是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锦标赛的结果。为了检验这种可能性，我们就以任职时间 ≥ 3 年的 837 个市委书记-年样本为计量分析的对象并重复表 6 的计量分析过程。同样，回归结果与表 6 非常相似，故也不再单独报告。

第三步，进一步剔除职位未发生变动的市委书记-年样本³³。我们清楚地知道，上述计量分析还存在一个现有文献普遍存在的缺陷，即那些职位未发生变动的市委书记，其职位变动赋值却与实际发生平调的情况相同，即都为 0。尽管中国地方官员在规定的 5 年任职时间结束前职位发生变动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毕竟还是受到 5 年任职时间的制度约束。这意味着，即便某个市委书记的职位在某年未发生变动，这也未必是上级组织根据其经济增长业绩所做出的人事决定。为了排除这种干扰，我们进一步剔除那些职位变动定义为 0 但实际无职位变动的市委书记-年样本，即仅以任职时间 ≥ 3 年且职位确实发生变化的 369 个市委书记-年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注：一些市委书记个人数据的不完整而导致 stata 实际使用的样本数下降为 335 个）。由于未发现支持晋升标尺竞赛假说的证据（见表 11），因此我们重点考察是否会存在晋升锦标赛或者资格赛。

我们再次重复表 6 的计量分析过程，相应的回归结果见表 7。显

33. 即便不剔除市数量 < 10 的省份样本，以下所有的计量结果在性质上都不改变，但考虑到严谨性和节省篇幅，故未单独报告。

然，我们仍然无法得到支持晋升锦标赛假说的证据，因为：面对一个省一年晋升的市委书记人数通常不多于 2 的事实，经济增长率排前 1，2，3，甚至 4 的回归系数却不显著。不过，当且仅当 $N=10$ 时，前 1 年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10 的回归系数为 0.311 且在 5% 水平上显著，前 3 年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10 的回归系数为 0.297 且在 10% 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虽然排序最靠前的市委书记却未必有更多的晋升机会，但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10 的市委书记比其他市委书记具有更多的晋升机会。换句话说，虽然市委书记之间不可能存在基于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的锦标赛，但却可能存在基于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的资格赛，只不过这是一种非常宽松的资格赛——享有参赛资格的人数远远大于实际的晋升机会。

表 7 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N 的哑变量设置及其回归分析结果

(市委书记-年样本范围：地级市数量 > 10、任职时间 $T \geq 3$ 且职位变动)

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N 为 1，否则为 0											
	g_1	g_3		g_1	g_3		g_1	g_3		g_1	g_3
N=1	0.071	-0.001	N=4	0.015	-0.042	N=7	0.116	0.213	N=10	0.331**	0.297*
	(0.282)	(0.301)		(0.133)	(0.152)		(0.132)	(0.140)		(0.155)	(0.164)
N=2	0.009	-0.095	N=5	0.049	0.078	N=8	0.165	0.223	N=11	0.209	0.304
	(0.203)	(0.196)		(0.131)	(0.142)		(0.133)	(0.144)		(0.182)	(0.192)
N=3	0.039	-0.097	N=6	0.099	0.099	N=9	0.229	0.118	N=12	0.146	0.158
	(0.147)	(0.171)		(0.130)	(0.138)		(0.140)	(0.155)		(0.210)	(0.212)

注：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9 的 1~2 列非常相似，故未列出。

现在，我们有必要追问：在经济增长率排序前 10 的市委书记之中，排序靠前，尤其是排序前 2 的市委书记是否会享有更多晋升机会？为此，在经济增长率排序是否是前 10 的哑变量基础上，我们在引入一个新的哑变量，即经济增长率排序是否是前 M（是为 1，否为

0), 而后将这两个哑变量同时作为解释变量引入计量模型。然而,

表 8 对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10 进行内部分组及其回归分析结果

(市委书记-年样本范围: 地级市数量>10、T≥3 且职位变动)

排序 1~M 为 1, 否则为 0 排序前 N=10 为 1, 否则为 0			排序 1~M 为 1, 否则为 0 排序 M+1~10 为 1, 否则为 0								
M	g_1	g_3	M	g_1	g_3	M	g_1	g_3	M	g_1	g_3
M=1	0.125 (0.329)	-0.032 (0.364)	M=3	-0.026 (0.173)	-0.139 (0.207)	M=1	0.444 (0.339)	0.267 (0.374)	M=3	0.313* (0.189)	0.195 (0.221)
N=10	0.318** (0.157)	0.300* (0.166)	N=10	0.339** (0.166)	0.334 (0.173)	2~10	0.309** (0.153)	0.300* (0.166)	4~10	0.339** (0.166)	0.334** (0.174)
M=2	0.0125 (0.232)	-0.147 (0.235)	M=4	-0.05 (0.161)	-0.098 (0.184)	M=2	0.341 (0.248)	0.179 (0.253)	M=4	0.304* (0.174)	0.238 (0.201)
N=10	0.328** (0.159)	0.326* (0.170)	N=10	0.354** (0.172)	0.335* (0.176)	3~10	0.328** (0.159)	0.326* (0.170)	5~10	0.355** (0.173)	0.336* (0.177)

注: 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9 的 3~4 列非常相似, 故未列出。

无论 M=1、2、3 或 4, 该哑变量的回归系数都不显著, 而是否是前 10 的哑变量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且系数也非常接近(见表 9 的左侧部分)。这意味着, 在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10 的市委书记之中, 排序靠前的市委书记未必有更多的晋升机会。

我们还进一步追问: 在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10 的市委书记之中, 排名靠前的市委书记是否比其他市委书记享有更多晋升机会呢? 为此, 我们按如下方式设置两个测度经济增长业绩的哑变量, 即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是否是前 M (是为 1, 否为 0), 和是否是属于 M+1~10(是为 1, 否为 0)。回归结果见表 9 的右侧部分。从中可发现: 无论 M=1、2、3 或 4, 排序 M+1~10 的哑变量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 但排序前 M 的哑变量通常也不显著, 仅仅前 1 年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3 和前 4 的哑变量开始在 10%水平上变得显著为正。这意

味着，与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 10 之后的市委书记相比，排序在 3~10

的市委书记显著

地享有更多的晋

升机会，但排序前

2 位的市委书记未

必有更多晋升机

会。换句话说，与

排序前 2 位的市委

书记相比，排序在

3~10 的市委书记

反而可能享有更

多的晋升机会。

为展示上述

计量分析的全貌，

我们在表 9 中列出

了 4 个代表性的计

量模型的完整回

归结果。与表 5 的

全样本回归结果

相比，虽然除经济

增长业绩指标之外，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在性质上基本保持不

变，但还是有一些现象值得关注。第一，GDP 全省占比的回归系数

表 9 限制市委书记-年样本范围的回归分析结果
(市委书记-年样本范围：地级市数量>10、T≥3 且职位变动)

	(1)g_1	(2)g_3		(3)g_1	(4)g_3
排序 1~2	0.0125 (0.232)	-0.147 (0.235)	排序 1~2	0.341 (0.248)	0.179 (0.253)
排序前 10	0.328* (0.159)	0.326* (0.170)	排序 3~10	0.328* (0.159)	0.326* (0.170)
GDP 占比	12.03*** (2.013)	11.58*** (1.976)		12.03*** (2.013)	11.58*** (1.976)
人均 GDP	0.0174 (0.0696)	0.0260 (0.0674)		0.0174 (0.0696)	0.0260 (0.0674)
年龄	-0.0690** (0.0285)	-0.0735** (0.0290)		-0.069** (0.0285)	-0.074** (0.0290)
≥57 岁	-0.531** (0.233)	-0.508** (0.230)		-0.531** (0.233)	-0.508** (0.230)
≥大学	-0.0396 (0.378)	-0.0246 (0.365)		-0.0396 (0.378)	-0.0246 (0.365)
专业	0.155 (0.190)	0.203 (0.190)		0.155 (0.190)	0.203 (0.190)
本省籍	0.134 (0.151)	0.119 (0.153)		0.134 (0.151)	0.119 (0.153)
任职时间	-0.0399 (0.0540)	-0.0351 (0.0535)		-0.0399 (0.0540)	-0.0351 (0.0535)
原市长	-0.00919 (0.162)	-0.0285 (0.164)		-0.0092 (0.162)	-0.0285 (0.164)
省或中央	-0.311 (0.215)	-0.329 (0.216)		-0.311 (0.215)	-0.329 (0.216)
共青团	0.280* (0.155)	0.293* (0.153)		0.280* (0.155)	0.293* (0.153)
秘书经历	0.0698 (0.142)	0.0725 (0.143)		0.0698 (0.142)	0.0725 (0.143)
组织部门	0.190 (0.147)	0.198 (0.151)		0.190 (0.147)	0.198 (0.151)
经济部门	0.0474 (0.146)	0.0789 (0.146)		0.0474 (0.146)	0.0789 (0.146)
城市数量	0.0685 (0.0487)	0.0688 (0.0488)		0.0685 (0.0487)	0.0688 (0.0488)
切点 1	-3.161 (1.981)	-3.368* (1.962)		-3.161 (1.981)	-3.368* (1.962)
切点 2	-1.794 (1.982)	-2.000 (1.962)		-1.794 (1.982)	-2.000 (1.962)
省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335	335		335	335
对数似然比	-285.08	-286.74		-285.67	-286.08

不但始终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且数值从 3.2 左右飙升到 11.5 以上。这意味着，在市委书记的晋升竞赛中，GDP 占比的实际影响力可能远远大于在市委书记-年全样本下的估计值。第二，“任职时间”从显著变为不显著了，即对于任职时间 $T \geq 3$ 的市委书记来说，任职时间的增长不会再增加晋升机会了。第三，“城市数量”的回归系数从显著为正变为不显著，但这仍然不同于锦标赛假说的预测。

（三）官员任职地与官员特征之间的内生性检验

尽管不少学者已意识到官员的晋升机会很可能内生于其个人禀赋之中(Opper & Brehm, 2007; 陶然等, 2010)，但却少有文献检验这些内生性问题。即便有这方面的尝试，也因计量模型中未引入反应辖区经济规模的变量而将注意力放在了考察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率是否内生于其特殊的政治关系中(Jia et al., 2013)。然而，无论是以市委书记-年的全样本还是限制样本范围的计量分析都发现：相对于经济增长业绩，任职地的 GDP 全省占比对市委书记的晋升具有最稳定且最重要的影响。同时，上述计量分析还发现，除“共青团工作经历”之外，其他反应市委书记个人禀赋特征的变量（比如，来自省级或中央机关，秘书、组织部门和经济部门工作经历）似乎对其晋升都没有显著影响。那么，我们自然会问：难道市委书记的这些个人禀赋条件真的不影响

其晋升机会吗？由此，一个猜想油然而生：

猜想 1 (即假设 6)：那些具有特殊政治资源的官员会被有计划地

派往 GDP 省内占比较高的地区任职，从而为事后的晋升打下伏笔。

如果猜想 1 被证实为真，那么我们不禁会进一步猜想：

猜想 2：GDP 省内占比较高的地区，其经济增长率的省内排序也不会太靠后，以至于那些有特殊政治资源的官员不太可能因经济增长业绩太差而失去晋升资格。

我们以 20 个省的市委书记上任前 1 年的数据来检验上述两个猜想。这是因为：(1)在斟酌将某为干部派到何处任市委书记时，上级领导只能观察到各市的现状并以此来预测未来；(2)大量的行为经济学实验发现最近 1 期发生的事件对决策者的信念影响最大；(3)上任之后的经济增长及其经济规模的变化有多个难以被独立识别的来源，比如市委书记自身的能力和努力，上级组织给予的特殊政策和辖区内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不过，对于“年龄”和“是否 ≥ 57 岁”，我们仍然使用市委书记上任当年的数据，因为上级领导在决策时可完全考虑到这些信息。

1、市委书记任职地是否内生于个人禀赋

为了检验猜想 1，我们分别以市委书记上任前 1 年所在辖区 GDP 的全省占比及其排序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市委书记的个人禀赋作为解释变量。回归结果（见表 10）显示：

第一，尽管前面的回归结果显示年龄，尤其是“是否 ≥ 57 岁”对市委书记晋升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在选派市委书记的人事决策中那些年龄较大，尤其是年龄超 ≥ 57 的市委书记更可能任职于 GDP 省内占比较大的城市。可能的原因是：(1)年龄较大的市委书记经验更丰

富，办事更稳重，因此被派到更重要的地方任职；(2)正如前面所言，年龄超 57 岁的市委书记一般不再有进一步晋升的希望，因此这种邻近退休前的“提退”（提拔之后即刻退休）给予了那些上级认为干得还不错的干部一次晋升机会，以便其可以享受更好的退休待遇；(3)可能是一种巧妙的政治布局，即为上级真正计划要提拔的对象预留出一个重要的市委书记岗位。

第二，来自省级以上机关的市委书记更容易被派到 GDP 全省占比较

表 10 市委书记任职地与个人禀赋的相关性分析

(注：因变量为市委书记上任前一年的数据)

变量	GDP 占比	GDP 占比排名	增长率排序	增长率排前 10
年龄	0.0021** (0.0008)	-0.0901* (0.0511)	-0.101* (0.0550)	0.0117** (0.0053)
≥57 岁	0.0398* (0.0207)	-2.017** (1.003)	-1.632 (1.053)	0.194** (0.0719)
≥大学	0.0074 (0.0133)	-0.376 (0.835)	0.660 (0.992)	-0.0139 (0.0983)
省或中央	0.0266*** (0.0080)	-0.629 (0.421)	0.0879 (0.431)	-0.0451 (0.0422)
省籍	-0.0219*** (0.0065)	0.821** (0.381)	0.194 (0.402)	-0.0466 (0.0377)
专业	0.0069 (0.0074)	-0.103 (0.461)	0.796 (0.515)	-0.0724 (0.0482)
共青团	0.0146** (0.0061)	-0.180 (0.363)	0.0157 (0.393)	0.0025 (0.0379)
秘书经历	0.0062 (0.0052)	-0.375 (0.339)	-0.622* (0.369)	0.0278 (0.0349)
组织部门	-0.0159** (0.0063)	0.722* (0.399)	0.584 (0.452)	-0.0400 (0.0458)
经济部门	-0.0055 (0.0057)	0.179 (0.372)	-0.196 (0.394)	0.0681* (0.0369)
_cons	0.0055 (0.0514)	9.410*** (3.017)	8.088** (3.151)	0.468 (0.302)
省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³⁴	643	643	568	573
Prob>F	0.000	0.000	0.000	0.000
R ²	0.182	0.195	0.188	0.209

大的地级市任职。这意味着，尽管在前面的计量分析中“来自省或中

34. 根据我们对任职时间的定义，那些在 2003 年任职时间标示为 0 的市委书记其实上任于 2002 年下半年。这就导致在我们的 2003-2012 数据库中重新上任市委书记（任职时间为 0）的人次大于市委书记职位真实变动的人次。

央”对市委书记的晋升的回归系数始终不显著，但它对市委书记晋升的影响却实际存在，只不过这种影响已被隐藏在任职地的特征上。

第三，有共青团工作经历的干部被提升为市委书记时，容易被派到经济规模大的地方任职，而预示着更大的晋升空间；相反，有组织部门工作经历被提升为市委书记时，容易被安排到 GDP 全省占比小的地区，从而限制了其进一步晋升的空间。

第四，来自本省籍的市委书记却容易被派到经济规模小的地级市任职，从而很可能只能享有较小的晋升机会。

此外，表 10 还显示，是否来自省和中央机关、是否有共青团经历、是否来自组织部门等个人禀赋特征与上任前一年辖区经济增长率排名或者排名是否是前 10 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地相关性；虽然有秘书工作经历的人容易派到经济增长潜力大的市，但该市的经济规模却不见得大。总之，市委书记被任命到何地任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某些个人禀赋所决定；而且，那些有特殊政治资源的市委书记偏爱 GDP 全省占比大而不是经济发展潜力大的地区，因为这会使他们在事后天然地获得某种晋升优势。

2、经济增长能力与市经济实力之间是否存在内生性

现在我们再来考察猜想 2，即市委书记任职地的 GDP 全省占比是否也暗示该地级市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潜力。为此，设置这样一个哑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即市委书记上任前 1 年的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是否是前 10（是为 1，否则为 0）。我们采用 probit 方法并控制了年份和省份效应而发现：市委书记上任前 1 年的 GDP 全省占比的回归

系数为 2.303 且在 10%水平上显著,即 GDP 全省占比大的城市其经济增长潜力也不会太差。这暗示,任职这些城市的市委书记,在日后的晋升竞争中不太可能因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名太靠后而失去参与晋升竞争的资格。

不过,与 GDP 占比相比,经济增长率及其省内排序却比较容易改变。因此,对于大多数市委书记来说,即便被安排到 GDP 占比较大的城市任职,也必须努力发展地方经济,以防止在晋升竞争中失去参赛资格。

表 11 限制市委书记-年的样本范围及其对标尺竞赛假说的检验

	市委书记-年样本:地级市数量>10,T≥3				市委书记-年:地级市数量>10,T≥3 且职位变动			
	(1)g_1	(2)g_3	(3)g_1 排序	(3)g_3 排序	(1)g_1	(2)g_3	(3)g_1 排序	(3)g_3 排序
经济业绩	0.0034 (0.0075)	-0.0156 (0.0153)	0.0016 (0.0101)	-0.0052 (0.0104)	0.0274 (0.0252)	-0.0138 (0.0244)	-0.0144 (0.0152)	-0.0188 (0.0167)
GDP 占比	4.997*** (0.943)	5.003*** (0.943)	4.989*** (0.941)	4.982*** (0.944)	11.87*** (1.986)	11.79*** (1.992)	11.87*** (1.975)	11.71*** (1.966)
省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833	833	833	833	335	335	335	335
对数似然比	-545.48	-545.05	-545.51	-545.41	-288.09	-288.51	-288.22	-288.00

注: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5 的 1~4 列或者表 9 非常相似,故未列出。

七、稳健性检验

(一) 否定标尺竞赛假说的稳健性分析

我们已在市委书记-年的全样本范围内证明，在中国市委书记之间不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标尺竞赛（见表 5 第 1~4 列）。事实上，在限制市委书记-年的样本范围之后，我们仍然无法找到支持晋升标尺竞赛假说的证据（见表 11）。

（二）扩大晋升范围

在现实，除了前面所规定的那些晋升情形之外，普通市的市委书记调任省长助理、省政府秘书长和强势部门（发改委、财政厅、教育厅）正职通常也被视为晋

升，尽管行政级别并未发生变化。在扩大了晋升范围之后，利用地级市数量 >10、任职时间 $T \geq 3$ 、职位变动的市委书记-年样本，重复表 9 的计量分析过程（见表 12）。除了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10 内的分割方法变为了排序前 3 和排序 4~10 之外，回归结果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表 12 扩大晋升范围的回归结果

	(1)g_1	(2)g_3	(3)g_1	(4)g_3	
排序 1~2	0.086	0.003	排序 1~3	0.243	0.220
	(0.234)	(0.233)		(0.192)	(0.221)
排序前 10	0.312**	0.282*	排 序	0.348**	0.304*
	(0.157)	(0.167)	4~10	(0.169)	(0.177)
GDP 占比	10.11***	9.745***		10.01***	9.723***
	(1.761)	(1.739)		(1.782)	(1.745)
省效应	Yes	Yes		Yes	Yes
年份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数	336	336		336	336

注：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9 非常相似，故未列出。

（三）以经济增长率省内前几分之几赋值³⁵

35. 感谢一个审稿人提出了这种资格赛的赋值方法。

现在我们来考虑另外一种可能的晋升资格赛的资格认定方式，即若前 1 年经济增长率 (g_1) 或者前 3 年经济增长率(g_3)属于省内所有城市的前几分之几，则该市委书记将有资格参与晋升竞争（赋值为 1），否则没有资格（赋值为 0）。在这种赋值方式下，我们可以将所有的 20 个省的、任职时间 $T \geq 3$ 且职位变动的市委书记-年样本作为考察对象，并重复表 9 的回归分析过程。遗憾的是，我们尝试了各种分割方法却未得到显著地回归结果。其中表 13 展示了几个代表性的赋值方式。

表13 以经济增长率省内前几分之几赋值及其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8)
	$g_{1top1/2}$	$g_{3top1/2}$	$g_{1top2/3}$	$g_{3top2/3}$	$g_{1top3/4}$	$g_{3top3/4}$	$g_{1top4/5}$	$g_{3top4/5}$
经济增长	0.0614	0.0857	0.102	0.130	-0.00861	0.0864	-0.0911	0.130
业绩	(0.129)	(0.133)	(0.131)	(0.137)	(0.139)	(0.147)	(0.142)	(0.147)
rgdp	8.749***	8.701***	8.717***	8.696***	8.754***	8.738***	8.734***	8.726***
	(1.494)	(1.488)	(1.497)	(1.495)	(1.490)	(1.495)	(1.492)	(1.503)
观测数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384

注：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 9 非常相似，故未列出。

(四)、是否可能是淘汰赛

为检验是否存在“末（几）位淘汰制”，本文尝试令 GDP 增长率省内排名后 n ($0 < n < 7$) 为 1，之前的为 0。在任期 ≥ 3 年且职位实际发生变动的市委书记样本中，未得到支持这种假说的证据。

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其他一些稳健性检验。比如，借鉴张军和高远（2007）的方法而将那些在同一地市前任市长后任书记的官员，

合并计算任职时间；剔除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年样本。不过，本文的基本结论都不发生改变，即在市委书记的晋升竞争中，没有找到支持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标尺竞赛假说和锦标赛假说的证据；仅在严格限制市委书记-年样本范围的情况下能够为资格赛假说找到一些证据，而且经济增长业绩前几名的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不如排序中等的市委书记。

八、结论

我们考虑到管理和发展地方经济的任务主要由市县级政府承担且主要的操盘手通常是市县书记，因此本文收集整理了2003~2012年中国20个省份市委书记的仕途数据，以便考察经济增长业绩是否真得会影响地方领导的晋升。同时，与已有的实证研究不同，我们特别强调在现实中更有可能是以经济增长率的省内排名来评价市委书记的经济增长业绩。我们的经验研究发现：

第一，在任职时间超过1年的市委书记-年的全样本分析中，我们没有找到支持市委书记之间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竞争的证据。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是：大约1/3的市委书记职位变动和大约1/3的市委书记晋升发生在任职时间不足3年期间，而这些职位变动应该与市委书记的经济增长业绩没有关系。

第二，在任职时间超过3年且职位确实发生的市委书记-年的样本范围内，我们仍然没有发现支持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标尺竞赛

和锦标赛的证据，而仅仅发现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名前 10 的市委书记可能比其他市委书记享有更多的晋升机会。这意味着，即便真的存在基于经济增长业绩的晋升竞争，那么也只可能是一种非常宽松的晋升资格赛，因为：在绝大多数时候，一省一年获得晋升的市委书记人数都不超过 2 个；而且，那些市数量>10 的省份的平均的城市数量也就 14.5 个。另外，我们还发现，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前 2（或 3）的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可能还不如排序 3（或 4）~10 的市委书记，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一些普通的市委书记试图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来增加晋升机会，但还是因为缺乏某些特殊的个人禀赋而不能实质性地提高自己在晋升竞争中的地位。

第三，与经济增长业绩相比，辖区的 GDP 全省占比对市委书记的晋升可能具有更重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在所有的计量分析该变量的回归系数都始终为正且在 1%水平上显著。而且，对于那些任职时间超过 3 年的市委书记，该效应更加突出。

第四，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一些具有特殊个人禀赋（比如来自省级以上机关、有团委或者秘书工作经历）的市委书记任职于 GDP 省内占比大的地区而不是潜在经济增长力强的地区。这也意味着，市委书记的仕途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其担任市委书记之前的某些个人禀赋所决定。

最后，与晋升锦标赛假说的预测不同，各省份下辖城市数量对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并不会造成系统性的负影响，即城市数量多的省份，其市委书记的晋升机会未必会减少。

总之，上述发现折射出中国官僚晋升机制的微妙之处。具体而言，在中国现有政治体制中，尽管有为数不少的市委书记可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晋升或者被贬黜，但大多数市委书记还是要在其岗位上历练较长时间。对于这些相对普通的市委书记来说，上级组织可能确实在执行某种基于省内经济增长业绩排序的资格赛制度。结果，即便某个市委书记因某些特殊的政治资源而被安排任职于 GDP 省内占比高的市而享有了某种晋升优势，但他在事前仍然不能保证任职之后的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序不会太靠后。这就会刺激市委书记们努力发展地方经济。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辖区间竞争过于激烈而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上级组织应该会根据参赛者（市委书记）的数量来调整晋升的岗位数量，从而控制资格赛的强度。当然，这种基于经济增长率省内排名的宽松的晋升资格赛也为中央和上级组织留下了足够的自由处置权，从而有利于维护其权威；而且，这也可能更有利于从基层干部中培养和选拔出具有“治党治国能力”政治家，因为经济增长业绩好的地方领导未必就是担任更高领导职务的政治家人选。

参考文献

1. 杜兴强、曾泉、吴洁雯（2012）：《官员历练，经济增长与政治擢升——基于1978~2008年中国省级官员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第2期。
2. 林挺进（2010）：《中国地级市市长职位升迁的经济逻辑分析》，《公共管理研究》第5期。
3. 陶然、苏福兵、陆曦、朱昱铭（2010）：《经济增长能够带来晋升吗？——对晋升锦标赛理论的逻辑挑战与省级实证重估》，《管理世界》第12期。

4. 王贤彬、张莉、徐现祥 (2011):《辖区经济增长业绩与省长省委书记晋升》,《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1期。
5. 王贤彬、徐现祥 (2008):《地方官员来源、去向、任期与经济增长》,《管理世界》第3期。
6. 杨其静、聂辉华 (2008):《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经济研究》第3期。
7. 姚洋、张牧扬 (2013):“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经济研究》第1期。
8. 张军 (2005):《中国经济发展:为增长而竞争》,《世界经济文汇》第4期。
9. 张军、高远 (2007):《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11期。
10. 周黎安 (2004):《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经济研究》第6期。
11. Besley, Timothy and Case, Anne. “Incumbent Behavior: Vote Seeking, Tax Setting and Yardstick Compet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 85, pp.25-45.
12. Bo, Zhiyu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Political Mobility: Chinese Provincial Lead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96, 5(12), pp.135-154.
13. Chen, Ye; Li, Hongbin and Zhou, Li-an.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he Turnover of Provincial Leaders in China.” *Economics Letters*, 2005, 88, pp.421-425.
14. Guo, G. “Retrospective Economic Accountability under Authoritarianism: Evidence from China.”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7, 60(3), pp.378-390.
15. Jia, Ruixue; Kudamatsu, Masayuki and Seim, David. “Complementary Roles of Connections and Performance in Political Selection in China.”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Stockholm University, Discussion Paper No. 9523. 2013,
16. Landry, Pierre. “The Political Management of Mayors in Post-Deng China.” *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3, 17, pp.31-58.
17. Lazear, Edward and Rosen, Sherwin. “Rank Ordered Tournaments as Optimal Labor Contrac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1, 89, pp.841-864.

18. Li, Cheng and Bachman, David. "Localism, Elitism, and Immobilism: Elite 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Post Mao China." *World Politics*, 1989, 42(1), pp.64-94.
19. Li, Hongbin and Zhou, Li-An.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5, 89, pp.1743-1762.
20. Maskin, Eric; Qian, Yingyi and Xu, Chenggang. "Incentive, Information, and Organization Form."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0, 67(2), pp.359-378.
21. Mei, Ciqi. "Bring the Politics Back In: Political Incentive and Policy distortion In Chin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2009.
22. Opper, Sonja and Brehm, Stefan. "Networks versus Performance: Political Leadership Promotion in China." Lun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2007.
23. Shih, Victor; Adolph, Christopher and Liu, Mingxing. "Getting Ahea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Explaining the Advancement of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in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2, 106(1), pp.166-187.
24. Shleifer, Andrei. "A Theory of Yardstick Competit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5, 16(3), pp.319-327.

(供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所有权利保留。

任何机构或个人使用此文稿时，应当获得作者同意。)